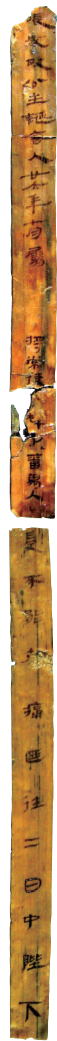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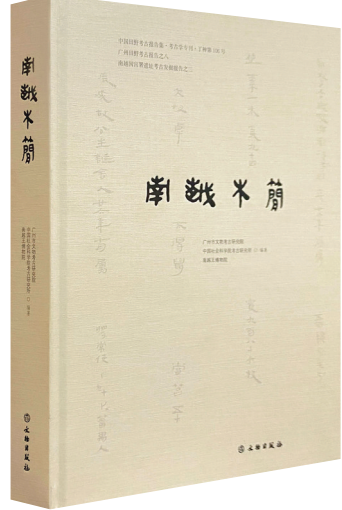
上:简091 □张成故公主寝宫人廿六年七月属 蒋常使□□□番禺人 下:简116 受不能免痛迺往二日中陛下

《南越木简》序

刘庆柱



《南越木简》付梓之际，课题组同志嘱我作序。“南越木简”出土于“南越国官署遗址”。“南越国官署遗址”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连串重要考古发现，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当时负责“南越国官署遗址”发掘的麦英豪先生，邀请我到广州考察，他希望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把这一考古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广州市考古机构有着很好的合作历史传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南越王墓发现伊始，麦英豪先生就向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提出合作发掘南越王墓的建议，并得到夏鼐先生的积极支持，随后双方开展的南越王墓田野考古工作合作密切，田野考古报告《西汉南越王墓》整理、编著合作更为紧密，此书出版以后荣获“夏鼐考古学一等奖”，获得学术界的赞誉。鉴于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表示愿意与广州市文物考古机构合作开展“南越国官署遗址”考古工作。随后麦英豪先生邀请我赴广州商谈今后“南越国官署遗址”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思路与实施计划。我认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南越国官署遗址”考古工作的“重点”“学术突破点”与考古“切入点”应该集中在南越国王宫及其宫殿建筑遗址。麦英豪先生赞同我的上述意见，并希望我提出一个近期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南越国官署遗址考古工作重点、学术突破点、考古工作的切入点等问题的思路。我询问了90年代以来“南越国官署遗址”的考古发现具体情况，他提到1995年考古发现了南越国官苑的“蕃池”遗址，1996年夏秋之际又在“蕃池”遗址以西30米考古发现了一个南越国时期的“水井”，“水井”西侧大灰坑内发现大量砖瓦建筑材料堆积。根据麦英豪先生提供的以往考古工作信息，我根据在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掘的经验，建



议以“蕃池”西部“水井”遗址为基点，向西北部安排试掘探方，开展寻找“宫殿建筑遗址”的考古工作技术路线。2000年初，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南越王宫博物院筹建处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合作考古勘探、发掘南越国官城遗址，首先通过考古试掘确认了水井西北部的“宫殿建筑遗址”(编号“南越国王宫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其后在其附近进行了考古勘探、发掘工作，证实南越国的宫殿遗址就在儿童公园之下。这一重要发现曾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一发现十分重要，也有一些著名考古学家质疑这不是南越国宫殿建筑遗址。时间是检验科学的重要因素，随着南越国官城及宫殿建筑遗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重要考古发现一个又一个地面世，南越国都城、官城、宫殿遗址得到学术界认同，那些“质疑”之声也就销声匿迹了。广州市政府面对南越国王宫、宫殿建筑遗址的考古发现，果断、迅速作出时任市长林树森所说的“如果儿童公园发掘出南越国时期的宫殿遗址，儿童公园整体搬迁”重要决定，2002年儿童公园进行了整体搬迁。2003年后，联合考古队在南越国官城遗址先后考古发掘了南越国王宫“一号宫殿遗址”“二号宫殿遗址”，究明了“官城遗址”范围，使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官城遗址”得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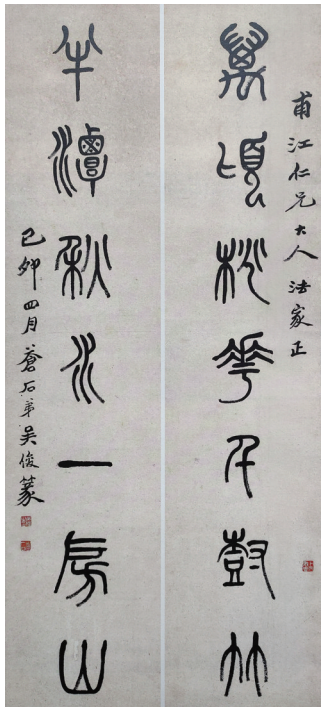
全面保护并展示给世人。2011年我与原广州市市长、贵州省省长林树森同志作为“第十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的代表，在台湾参会期间，我们又愉快地回忆起十多年前这件事，我想当时正是林树森市长的“搬迁儿童公园”的果断决定，使“南越国官城遗址”得以保存，并能够得以进行大面积的考古发掘，从而使一些重大考古发现成为现实。现在即将付梓的考古发掘报告《南越木简》，就是儿童公园整体搬迁之后的那些重大考古发现的科研成果之一。《南越木简》一书是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联合考古队在南越国官苑遗址潜水井(编号J264)考古发掘及出土南越国时期木简的田野考古报告。该报告是联合考古队同志对J264潜水井考古发现及多学科、跨学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成果，其中尤为J264出土木简学术意义最为重要，因此这项考古发掘、研究的考古报告，命名为《南越木简》。以往出版的秦汉简帛考古报告也有不少，但是我读了《南越木简》稿，觉得该课题编著者的这部“考古报告”，其“木简”的学术意义“非同一般”，“考古报告”的编者特点很有“考古学特色”，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点：**南越木简属于西汉诸侯王国——南越国王宫木简文书** 南越木简出土于南越国王宫之官苑中的潜水井使用过程形成的堆积中，木简出土“空间”位置说明这些木简应该是王宫“使用”的遗存。进一步的佐证是木简中的文字也充分说明了这点，如木简中的“陛下”“公主”“官门”“守苑”“番禺”“南海”等木简文字，均与南越国王宫相关事务有关。再有，其中一些简文内容多与南越国王宫相关，可能有的就是王宫文书。木简之中文字多有涉及法律、籍簿等文书内容，诸如律令、爰书、奏谢书等，属于籍簿内容的出入籍、门籍、物籍等。木简文字记载的职官、刑法、赋税、从军等内容，无疑折射出木简出土地的政治与社会历史，这恰恰与南越国官城遗址的“性质”是一致的。上述木简因为出土

于南越国官城遗址，官城作为南越国的政治中心，其木简文字内容自然与南越国历史密切相关。这批木简不是墓葬中的“随葬品”，而是官方的“文书”，而且又不是一般“县级”的“官方文书”，而是“王宫文书”，这是首次发现的西汉诸侯王的都城、官城之中的具有王宫文书性质的“简”。**南越木简填补了《史记·南越列传》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记载** 木简及碎片共计136枚，墨书文字共约1200字。《南越木简》作者认为木简时代属于南越国早期，其年代早于《史记》80年，而刘瑞统计《史记·南越列传》共计2480字，而南越国王官遗址出土南越木简的现存文字约1200字，其中大多又为历史文献记载中所未见或不见，对于南越国及西汉诸侯王国历史研究意义重大。**南越木简是“中华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的重要佐证之一** 南越国作为距离秦汉帝国最远的地区之一，南越木简的文字及体例与中原地区的汉代书简、律简相同，加之考古发现南越国都城、官城遗址及南越王墓的建筑形制、出土遗物等“国家文化”载体与“大中原地区”的同类遗存的一致性，这些考古发现物化载体证实了华南地区早在秦汉时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圈”的组成部分。**《南越木简》考古报告的“考古学”特色** 多年来各地考古发现的简帛类遗存为数不少，近年来也整理、编写、出版了一批简帛类考古报告，但是《南越木简》与以往“简牍报告”所不同的是，本报告编著者注重以考古学方法进行木简“自身”及木简文字所涉及环境与社会的深入研究，如《南越木简》中的植物遗存、动物骨骼等分析，尤其是木板、木片、木炭及植物叶片的分析、鉴定等，对于南越木简材料产地，以及进一步对木简文字的书写地与相关年代学支撑，均提供了科学支撑。可以说《南越木简》考古报告中“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在同类著作中是十分突出的部分，我们期待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出土文献类”(如甲骨文、金文、简帛等)田野考古报告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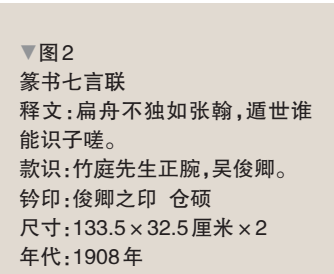
馆藏拾粹

从馆藏作品看吴昌硕篆书艺术成长及篆学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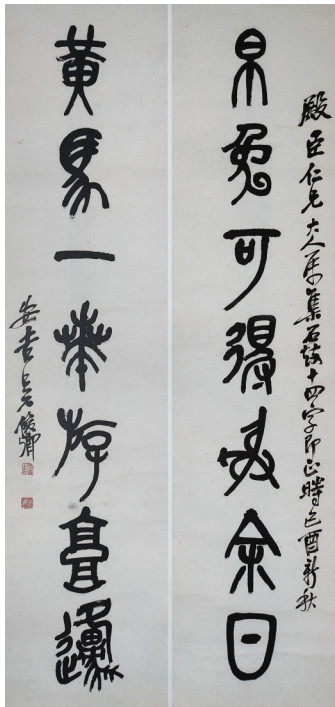
程卫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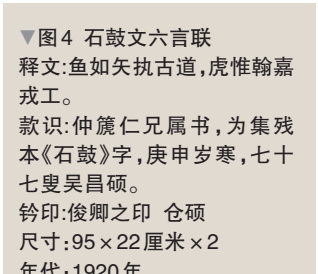
▲图1 篆书七言联 释文：万顷桃花千树竹，半潭秋水一房山。 款识：浦江仁兄大人法家正，己卯四月菴石弟吴俊篆。 钤印：卜居安吉 吴俊之印 菴石 尺寸：129×30厘米×2 年代：18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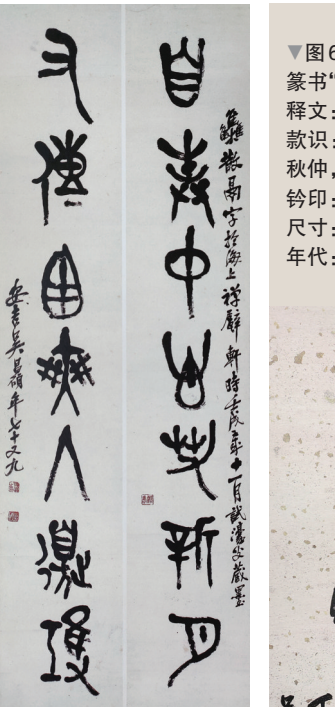
▼图2 篆书七言联 释文：扁舟不独如张翰，遁世谁能识子嗟。 款识：竹庭先生正腕，吴俊卿。 钤印：俊卿之印 仓硕 尺寸：133.5×32.5厘米×2 年代：1908年



▲图3 石鼓文七言联 释文：白兔可得射斜日，黄马一乘游高原。 款识：殿臣仁兄大人属集《石鼓》十四字，即正，时己酉新秋，安吉吴俊卿。 钤印：俊卿之印 仓硕 尺寸：136×32厘米×2 年代：1909年



▼图4 石鼓文六言联 释文：鱼如矢执古道，虎惟翰嘉戎工。 款识：仲麓仁兄属书，为集残本《石鼓》字，庚申岁寒，七十七叟吴昌硕。 钤印：俊卿之印 仓硕 尺寸：95×22厘米×2 年代：1920年



▲图5 集散氏盘七言联 释文：自奉中心若新月，又传西爽入边鸿。 款识：集散离字于海上神骥轩，时壬戌岁十一月，试濠叟藏墨。安吉吴昌硕年七十九又九。 钤印：鹤寿 俊卿之印 仓硕 尺寸：147×26厘米×2 年代：1922年



▼图6 篆书“寿”字轴 释文：寿 款识：犀园仁兄三十六庆，丁卯秋仲，吴昌硕，年八十四。 钤印：俊卿之印 仓硕 尺寸：149.5×40.5厘米 年代：1927年

吴昌硕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艺术大师，融“诗、书、画、印”四绝于一炉，取得了杰出成就。著名书法家、篆刻家沙孟海曾说道：“昌硕先生以诗、书、画、印四绝雄视一世，一般看法，他的最基本功夫是放在书法上的。”  
书法，是吴昌硕艺术的基础，绘画离不开书法，篆刻更是离不开书法。在诸多书体中，吴昌硕一生用力最勤的便是篆书。对石鼓文书法的毕生探究，成就了他的篆书艺术，并且在临学过程中，能够做到汲古出新，形成自己的风格。吴昌硕的艺术成就，并不仅仅靠天赋，更是他比常人付出了百倍的努力。  
笔者供职于吴昌硕纪念馆，常年沁润在艺术大师的作品中，特别是对馆藏同时期吴昌硕的篆书作品，通过反复研学，感悟颇深。现就其篆书艺术的成长和篆学思想谈点个人体会。

篆书艺术的成长之路

**以拓为本的研习阶段** 清末，习篆者多师杨沂孙、邓石如、吴熙载等诸家。吴昌硕在初学篆书时也不例外，从他早年的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杨沂孙作品的研习是下过一番工夫的。其书风特点是用笔含蓄凝练，结体工整严谨，圆中带方，方中有圆，婉转流畅，藏头护尾，如1879年吴昌硕为浦江仁兄所作作的篆书《“万顷半潭”七言联》(图1)。虽然此时他个人风格还没有明显呈现，但是对于篆书的学习却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为日后自身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丙戌年(1886)，吴昌硕与潘雁羊同游虎丘山，作诗相赠。潘雁羊知道吴昌硕一向对石鼓文有嗜癖，就将家藏的当朝名臣、书法家汪鸣鸾(字郁亭)收藏的石鼓精拓本赠答。吴昌硕如获至宝，沉迷于此，数十载反复临摹研习，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收获，由此奠定了他的篆书基础。吴昌硕还专门作了《瘦羊赠汪郁亭侍郎鸣鸾手拓石鼓精本》长诗，其中“金石刻画年复年，镞不能舍笔渐穷”“清光日照临池水，汲古并磨黄武”，道出了此时无限惊喜和决意终生学石鼓的决心。  
**贵能深造的探索阶段** 经过前一阶段的积淀和修练，吴昌硕对《石鼓文》的揣摩已有了相当的深度。以“画当出己意，摹仿随尘垢。即使能似之，已落古人后”及“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的思想指导其对“石鼓”的深入研习。他临摹石鼓文，在临习小篆的基础上，已不局限于一笔一画的描绘，随意取舍，使石鼓文渐生奇姿，“结法渐离原刻”，在中锋平正、结字宽绰的风格中蕴藏着即将爆发的“郁勃之势”。  
吴昌硕在65岁时，临石鼓文落款中称：“予学篆好临石

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此时，吴昌硕所写石鼓文注重的是整体气势的突出，达到了古人所说的“临气不临形”之境。如1908年，他为竹庭先生作篆书《“扁舟遁世”七言联》(图2)，一改原拓方正的结体，开始出现左低右高的偏斜之势，用笔粗细变化明显，有灵动之感。说明其篆书风格逐渐摆脱了石鼓文方正平整的结构，字形修长，姿态横生，正是受到小篆字形结构的影响。从结构上看，上紧下松，下半部分飘动摇曳，活泼灵动，神采奕奕。  
1909年，吴昌硕为殿臣仁兄属集石鼓十四字《“白兔黄马”七言联》(图3)，作品气势雄浑而韵味醇厚，沉重大气而又呆板，仔细研习不难看出，书家是以苍劲雄浑的石鼓之气统领整幅作品的气韵，又巧妙地揉入了小篆的劲挺秀雅之意，揭开了篆书书写的新篇章。此时，吴昌硕对石鼓文的学习又更上了一层楼。不论是对石鼓文的临摹还是集字鼓文的楹对墨迹，都是全出己意，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此期作品，凝练道物，打破原石鼓文的方整、均匀、对称，代之以左右上下相参取势，横画已无纯平的平直，长画则纵放有致，一个活脱脱的“吴氏石鼓”面目完全确立起来。

自成风格的成熟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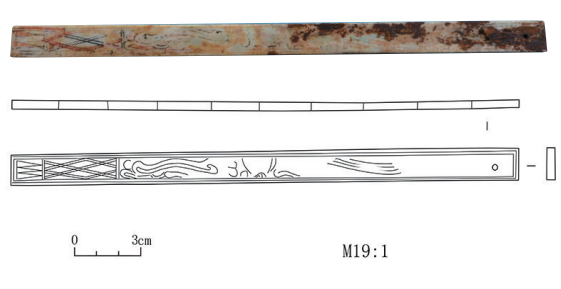
70岁以后，吴昌硕的石鼓书风已然成熟，其用笔的熟谙已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对临写石鼓文需掌握的要素“严重而不滞，虚宕而不弱”心领神会，字的线条丰富多变，常方圆互见。结体上则左右紧束，上下纵展，彻底改变了石鼓文方正圆匀平整的形态，充分显示出恣肆烂漫的艺术生命力，如1920年，吴昌硕为仲麓仁兄属书，为集残本石鼓字的《“鱼如虎惟”七言联》(图4)，线条纵横豪肆，结字以自然参差取势，凝重中更见活泼。  
吴昌硕不仅喜爱石鼓文，对散氏盘也偏爱有加，他将金文强烈的艺术个性，揉入了石鼓文当中，大大增加了其作品的艺术魅力，如1922年，吴昌硕试濠藏墨，集散氏字于海上神骥轩的《“自奉又传”七言联》(图5)，在用笔上用如“漏扁痕”的笔法和浓墨来表现散氏盘的恣意狂放，在字形结构上将散氏盘的天真自然融入石鼓文的创作中，错落险峻，随意布形，不拘一格，用笔如刀，给人以铜浇铁铸的力量。  
吴昌硕晚年书写的石鼓文，古朴又不乏灵动，充分显示了郁勃烂漫的艺术魅力，此时再临摹石鼓文便是了于心，取舍有度，到了洒脱取神、临神不临形的阶段。1927年吴昌硕为犀园仁兄三十六大庆作《寿》字(图6)，线条丰富多变、方圆结合、开合有度，功夫已臻登峰造极之化境。“石鼓篆书第一人”，再无人出其右。

篆学思想的鲜明个性

“昌硕石鼓”现已成为一个专门的艺术范畴，也是海派书法的巅峰。只要说到石鼓，自然要想到吴昌硕，言及吴昌硕亦必定会提到石鼓，两者已完全融合在一起。如果说石鼓文的书法端庄秀美、古朴浑雅、雄浑凝重，横整行格基本整齐，结体已近篆刻石，开小篆书体之先河，那么吴昌硕石鼓则呈现出另一种不可一世的浩大气魄，他以超人的才力，遥接先秦石鼓神秘之气息，然后化为己意而出之，“不是石鼓胜似石鼓”，具有空前的超越意义，形成了其鲜明而独特的篆学思想。  
用墨浩然，落笔豪肆，老辣苍劲，力能扛鼎，打破了古人写篆书线条粗细均匀、毫无变化的特点，取而代之的是以粗细变化的笔触来表现具有生命力的灵动线条，富有韵律，不计工拙，不斤斤于细部点画的描绘，整体用笔方中有圆，圆中有方，起笔干净利落，行笔、收笔道劲有力，中锋为本，亦善施侧锋，形成苍茫高古、立体感极强的笔致。从而体现出雄浑厚重，高雅质朴的崇高之美。  
结字迥异于原刻，打破了石鼓文的对称原则，进而建立了一种新的动态平衡。从方正之格局一变而为纵长体势，承邓石如一派法则知又有改天换地的变革，上紧下松，偏斜取势，形成了茂密峻伟、雄浑高古的吴昌硕石鼓形象。吴昌硕在篆书《小戎诗》四屏条的落款中记道：“篆成自视，圆匀似猗猗，而偏斜取势则又似《怡亭铭》。”敏感的吴昌硕从此书中找到了灵感，以偏斜取势来书写篆书，并加以夸张。这种偏斜取势的结体特征成为吴昌硕篆书与古人篆书的重大区别。  
自从1886年获得石鼓文拓本，直至终年，吴昌硕一直是临写、创作不辍，成就了一生辉煌的业绩。欣赏吴昌硕的作品，给人最直截的感受就是生动、博大、气势磅礴。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成就，除了其诗人气质、金石根基和画家灵性之外，主要是巧妙地把握了石鼓文作为过渡性书体的特征并加以夸张，有效地吸取了金文用笔的粗细变化、结体的灵动优美、章法的随意活泼以及小篆结体加长纵势分明的特点。吴昌硕的立场是“临气不临形”，他追求的更是“古人为宾我为主”。  
吴昌硕豪迈地挥动巨笔，创造了一个境界高远、意志万千的“动态石鼓”世界，开创和带动了一个时代崭新的书法面貌。石鼓文成就了吴昌硕，吴昌硕也让石鼓文得到传扬，可谓彼此相互成就。用吴昌硕自己的诗来说，就是“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

三门峡新出土骨尺的时代问题

胡焕英



M19:1  
2017年3月在河南省三门峡陕州区中欧物流工地M19墓葬出土一件骨尺。骨尺长23厘米，宽1.4~1.5厘米，厚0.4厘米，重24克。寸与寸之间距离不等，为2.15~2.45厘米。一端有孔，孔径0.2厘米，以便穿系。骨质淡黄色，整个尺面两头微翘，中间略有弯曲。正反相同墨色纹饰，尺面绘有边框，边框内绘主体花纹，有孔一端纹饰漫漶不清，无孔一端先是一组锯齿纹，第二组是一组菱形网纹，第三组是一组云纹。尺的表面和两侧用墨线刻出十等分线。整个骨尺小巧玲珑，纹饰精美。

尺是人们必备的生活工具，原始人布指为寸，布掌为尺，舒肘为丈。就尺度来说，自商代出现之后，经过两周时期的发展，从“布手知尺”到“累黍定尺”，从东周列国的各不相同到秦统一度量衡，到汉代承用秦制，尺度已经相当成熟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广泛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汉书·律历志》记载：“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也……一分一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存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云：“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绲罗。朝成绣袂裙，晚成单罗衫。”刀尺已成为古代妇女时刻不能离身的日用品。

汉代的尺度，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与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逐步得到深化。1937年，吴承洛的《中国度量衡史》已经注意到古代度量衡研究需史籍与实物相结合，并得出结论：西汉一尺合27.5厘米，新莽一尺合23.04厘米或23.75厘米。1964年，曾武秀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物资料对汉尺进行概括认为：西汉一尺为23~23.1厘米，新莽一尺为23.1厘米，东汉一尺为24厘米。1975年，天石根据考古出土的度量衡器、度量衡铭文，总结汉代尺度的数值：西汉前期(文、景、武帝)一尺合今22.5~23.5厘米，后期(昭、宣帝及以后)一尺合今23.5~23.75厘米，新莽一尺合今23~23.1厘米，东汉一尺合今23~23.8厘米。

1992年丘光明出版了《中国历代度量衡》，该书收录了1990年以前各地出土和各级博物馆的汉代尺度实物98件，研究者得出认识：西汉尺度长为23.1厘米，新莽尺长23.1厘米，东汉尺长23~24厘米。进而指出：纵观西汉400余年，西汉和新莽每尺平均长为23.1厘米，而东汉尺的实际长度略有增长，平均每尺长23.5厘米。上述结论作为汉代尺度研究的重要成果，已经为学术界广泛采用。2014年白云翔《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从新发现的78件尺度实物资料研究得知，汉代日常生活中一尺的实际长度，西汉和西汉中期一般是23厘米，东汉尺比西汉尺有所加长，标准值为23.4厘米较为合适。

此次发掘的三门峡陕州物流工地69座墓葬中，其中两汉墓葬64座，北朝墓3座，五代墓1座，清墓1座。整个工地墓葬东西分布，发掘次序从西到东，主要以西汉东汉墓为主，西边多为平顶或拱顶洞室墓，东边为砖券室大型东汉墓。M19墓葬位于西北部，为土洞式结构，灰砖竖铺墓底，砖尺寸为32×14×6.5厘米。方向170°，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道位于墓室的南侧，平面呈梯形，长1.6米，宽0.76~0.98米，深5.8米。墓口距地面距离1.2米。墓室平面为长方形，长3.28米、宽1.0米、高1.2米，墓室内被盜挖，无骨架，仅从北部灰砖第一排最西边的灰砖下面出土一件骨尺。墓葬结构基本上与《三门峡向阳汉墓》的M122、M76-1、M76-2、M41、M10的墓葬形制相同，为西汉晚期墓葬。骨尺与汉代尺度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中的纳林套海3号墓骨尺和纳林套海20号墓骨尺相似，为西汉晚期或新莽时期。综合分析，这件骨尺的年代可定为西汉晚期较为合适，该尺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度量衡制度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